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散文卷

作家写作家(C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作家写作家(C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我所认识的巴金老人	(1)
提笔成章	(26)
注一个“淡”字	(38)
书为友，案为邻	(57)
我和苏策	(67)
夕阳风采	(74)
铁凝的故事	(96)
路上的爱	(104)
我说郭风	(120)
冯至先生	(135)
伴随着时代的行吟	(143)
追昔抚今话周涛	(164)
难忘的教诲	(185)
超越苦难	(194)
关于诗人孙静轩的蒙太奇	(206)
长忆白素菊	(223)
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	(235)



作家写作家

沈从文组曲	(247)
泪洒柯克亚	(259)
缅怀秦牧老师	(273)
布衣林希	(280)
一颗真诚而炽热的心	(301)
卢跃刚速写	(308)



我所认识的巴金老人

荒 煤

一

在上海短暂停留的几天里，我几乎已经成为习惯，只要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呆一会，我就一定要打开窗子向浦东眺望，希望再次看到浦东大桥那高耸入云的巍峨身影。

这次到上海的日程较紧，已经预定了9日返京的机票，11月7日从广州到上海的当天下午，我就去参观了浦东大桥的建筑工地。

人的感觉往往是难以说明白的，当汽车穿过隧道驰向浦东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一种飘浮上升的感觉。我不禁想到，我这个生长在上海，曾在这里度过难忘的、贫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想到在青年时代又重返上海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现在，我这个飘荡在“长江上”，



作家写作家

唱了不少“忧郁的歌”^①的年近八旬的老人，终于在江底穿过浩浩荡荡的大江，即将看到腾空而起的浦东大桥了。

我想，这座大桥的建立，将是为一个更新的大上海起飞而展开的雄伟的翅膀。古老、拥挤、难以扩展的上海市区，一旦和浦东开发区联成一片，那时候，大上海该是什么样子呢？

我未必能看到这个开发区的建成了，然而参观了浦东大桥的建筑工地，看到那两个雄伟的钢柱竟像两座高塔似的相峙而立，我不能不感到心潮汹涌。

11月4日是星期天，头天晚上我已打电话告诉小林，约好在第二天上午去看望她父亲巴老。

这天早晨，我又站在窗前向浦东大桥眺望，因为有雾，依稀可见那钢柱高塔朦胧姿影，不觉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我想不起来，我有几年没来上海了，也想不起来为什么没有来，也想不起来有多久没有看到巴老了。渐渐地，我和巴老相识以来半个多世纪的许多往事不断地闪现在眼前，如梦似初，萦绕心头。

我都记不起来，我是在1934年秋冬还是在1935年

^① 《忧郁的歌》、《长江上》是我1935—1936年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两个短篇小说集。



春认识巴老的。

当然在认识以前，我已经读过他不少的作品，知道他是位“大作家”，而且真没有想到，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我第一次以荒煤这个笔名发表短篇小说之后，从此我就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和巴老有关。

我爱好文学，从1932年起就开始动笔搞创作和评论。但第一次提笔写小说，却是1934年春天，写了一篇《灾难中的人群》。说实话，当时写小说，主要是爱好，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要想拿点稿费维持生活。这篇作品听取了丽尼的意见作了些修改，他也动手作了些修改，然后就由他寄给巴金了。当时，我只想，随便找个刊物发表就行了，听丽尼说寄给巴金，我不免想到，我这个无名之辈的作品，巴金这样一位大作家他会看么？……没有想到，巴金看后又交给靳以，决定在《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小说寄出的时候，我用的是我的学名，有名有姓。不料武汉反帝大同盟遭到破坏，一位领导人被捕，又发现我、吕骥、张庚我们三个人的通讯处。同一天，我们三个人的转信的学校都有人去查问我们的住处（我们三个人都住在一起），就连夜转移，各奔东西，一时漂泊不定。

丽尼知道这个情况，听说小说决定要发表，当然不



作家写作家

能用我的原名了，却又一时记不起我过去的其他笔名，许是荒煤这个笔名有点怪，他记住了，就写信给靳以，改用荒煤这个笔名。

接着靳以又给丽尼来信，约我再给《水星》写篇小说，我就又写了一篇《刘麻木》。当然也是用了荒煤这个笔名。

从此，这个笔名也就奠定终身了——更有趣的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原定去鄂豫皖边区工作。我正式打报告给中央组织部，要求改名，废除荒煤这个笔名，因为我希望长期到地方基层工作，加强锻炼，不再搞文化工作，结果没有被批准。

二

我已经记不起来，是1935年在什么地方和时候认识巴老的。现在已经55个年头了。

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大概也可以概括巴老和我之间的友情。认识的时间很长，却并没有频繁的接触，还有两次较长的分离。1937年6月我到北平去，原想到绥远抗日前线去采访，后又决定去延安采访，不料因芦沟桥事变而陷于北平，后来随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从北平逃出，流亡至山东、徐州一带，于1938年后经武汉去延安，直到全国解放后，在1950年春因



公赴沪，整整阔别 14 年，我才再次见到巴老。

第二次久别是从 1964 年文化部整风之后。1964 年前，我几乎每年要到上海电影局、制片厂看影片，谈计划的，还能经常看到巴老。从 1964 年之后，经过“文革”，我被反复批斗了两年多，在监狱里关了七年，后来又被送回重庆市图书馆书库里清理旧书，写了三年卡片，直到 1979 年夏天，我到上海再次见到巴老，却又整整 15 个年头了。我年过花甲，巴老也已经是年逾古稀 75 岁的老人了。

我只记得那天上午，由文学研究所严平同志陪着我乘电车下来，走了许久，才找到巴老家门口，但我觉得心情激动，都无法举起胳膊来按电铃了……一下子看到巴老，我都说不出话来。我看到巴老显然苍老的面容，就立即想到张春桥那句杀气腾腾的话：

“巴金，不枪毙他，就是宽大！”

这个情景，至今想到也觉得哭笑不得！

历史是无情的，却也宽容。这个该枪毙的张春桥还在监狱里。他这个三十年代混在上海滩上的一个小小无赖文人，对手无寸铁的从事革命、进步文化活动的文化界人士，都恨不得一网打尽，置于死地，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这段历史真的都澄清了么？

我还想起来，1958 年夏天，我到上海去就听说了：



作家写作家

“柯庆施曾经讲过，思想解放，就要敢于批权威，上海就要动动巴金。”也可见是早有此心了。

巴金究竟有什么值得枪毙的“罪行”？！

.....

我和巴老的确接触不多，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也很难一一回忆起来，但我至今还有些片断零星的印象，是无法忘却的。

我 1935 年认识了巴金，那时我才 22 岁，心目中，总觉得巴金是一个当代大作家，已有很多作品与译作出版，而我才刚刚开始创作，是一个小青年，所以即使见面，加上我的个性也不大爱讲话，不免有些拘束，所以交谈不多。

可是一件小事，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印象。大概是 1936 年春天，我住在丽尼家里，后门就对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大门。有一天中午，我和丽尼的夫人许严在后门自来水过道里的炉边做饭，我正在炒菜，红烧豆腐。巴金和丽尼从出版社出来了，大概是有什么活动，巴金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刚要走，丽尼忽然叫住他，指着我笑道：“荒煤的拿手菜，味道蛮不错，你来尝尝！”我很不好意思，可是看到巴金笑嘻嘻走过来，说我尝尝，于是丽尼用一个小盘子装了两三块豆腐递给了巴金，巴金就站在后门口，穿着整齐的西装端着盘子吃完了豆



腐，还连声说：“不错，味道蛮好！”……

丽尼还说，哪一天让巴老来专门吃一次许严和我做的湖北菜……巴金说一定来，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也不记得是否请巴金吃了一顿湖北菜。但这一次，却使我心里产生一个可笑的想法，这个大作家还很随便，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严肃，难以接近。

之后，更深刻的一个印象，是巴老对鲁迅的尊重。

我只见过鲁迅两次。一次是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宴请鲁迅的宴会上，一次是在《作家》创刊后的一次宴会上。巴老总是紧紧挨近坐在鲁迅身边，很高兴、很热情地向鲁迅介绍会见的作家，鲁迅也总是随时站起身来亲切地和每一个青年作家握手。而我每次和鲁迅握手后都感到有些抱歉，因为兴奋和激动，我的手心总是泛起一阵冷汗。手特别凉。我看到巴老在鲁迅身边坐着，始终用一种充满着尊敬、坦诚、真挚的眼光注视着鲁迅，有时候看到鲁迅要站起身来与人握手时，不自觉地就伸手扶一下，始终认真地聆听鲁迅的谈话。总之，是一种无法形容却能直接感受到的真诚的、由衷的关怀和敬重的心情。

尤其是鲁迅逝世后，我亲眼看到巴老抬着鲁迅的灵棺走到墓地那种悲痛、深沉含泪的神情，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作家写作家

还有一件事是我不能忘却的，也从来没有讲过的。

在 1936 年两个口号的争论展开之后，有一次我遇到巴金和靳以，我们谈了一次话。当时，我参加了《文学界》的编委工作。

巴老首先说明，他们不了解这个争论的真相，说不清楚，不参预。但是，他们尊重“周先生”（指鲁迅），相信周先生，希望不再扩大这个争论了。靳以历来为人很坦率：就直接提出来希望我不要参加。甚至最后还明确告我：如果我生活上有困难，《文季月刊》可以多发表一些我的作品。

我当时实在无法说明这个问题，也弄不清楚这两个口号的论争的实质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没有参加当时的领导工作，许多情况弄不清楚，反正觉得是党提出来的，就去做。我感到为难的是不能告诉巴老和靳以，我是由组织上决定和沙汀、舒群、徐懋庸、黄洛峰一起参加《文学界》编委会的。

我只写过一篇文章：《国防文学是不是创作口号》，也只是根据我个人当时的理解和认识而写的，并没有想参加什么争论。

另外，我有一个简朴的观点，民族危机的时刻，大家都应该团结起来进行抗日战争，对主张抗日的活动都应积极加以支持。



所以，我热情地去参加了 1936 年 6 月 7 日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成立大会。同时，又感到有些奇怪，为什么鲁迅和另一些作家没有参加。但是，在这之前黄源同志有一天到丽尼家来找我们，拿出一张《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给我们看，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加签名。我至今也还清楚地记得，我看了之后立即回答：“为什么不参加，当然应该签名！”并立即签了名。黄源还高高兴兴地谈了一阵才离开。这就是 1936 年 6 月 15 日在《作家》一卷三期发表的以鲁迅、巴金为首的 63 个作家发表的宣言。

我一位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很快给我来了一封信，还责备我为什么在两个宣言上都签了名。

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徐懋庸个人竟然给鲁迅写了那样一封信，在论争中掀起了一场风暴。事后，我曾当面批评过徐懋庸，也竭力劝他不要再发表给鲁迅的回信，但他不听。我当时也不同意徐懋庸对巴金、黄源、胡风的评论。而且，在我和巴金、靳以谈话之后，我却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鲁迅怀着一种真挚的敬重之情！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事隔 40 多年，我在 1975 年 5 月被释放出狱的时候，在我的结论中还列有这样一条罪行：

“鼓吹‘国防文学’，对抗鲁迅”。



作家写作家

而始终尊重鲁迅的巴老，紧伴着鲁迅为开拓新文学运动作出重大贡献的巴老，竟也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更可悲的是，凡是参加论争的两方作者，也都遭到“四人帮”的迫害，似乎无一幸免。

三

尽管我到延安之后，主要是做教育、行政工作，创作不多，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几乎完全放弃了创作。但在建国之后，我还是受到巴老不断的鼓励，希望我还是要搞点创作，也的确使我曾经不止一次想重新提起笔来进行创作。

1950年夏天，解放后我第一次因公出差到上海，我就去看望了巴老。有一天，巴老和靳以请我在“红房子”餐厅吃西餐。相隔14年又重逢在上海，大家都很高兴。不料靳以突然问道：

“荒煤，你现在还想不想写小说？”

巴老没有说什么，但是微笑地注视着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愣了一下，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声嘟哝了一句：“我——我还是想写一点试试。”

不多久，我在武汉就接到巴老寄来的一大包书。其中都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译作，如鲁迅译的《死魂灵》，



巴金、丽尼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前夜》、《贵族之家》等。打开扉页，上面确有我当时的签名，是一个“梅”字。我也不知道巴老怎么知道这是我的书。

巴老在信上说，他在清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存档中发现了这批书，想我还是会很喜欢它们的，特地寄还给我。另外，他还发现有些我的手稿，觉得应该保存，就直接寄到北京图书馆去了。最后说，他能想象，我的工作很忙，但希望我还能抽空写点小说。

我这天晚上反复翻阅这些书籍和巴老的来信，为巴老这种真诚的关怀所感动，不免浮想联翩，真地动了心，想到应该写一个长篇小说：写一群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经过各自不同艰辛悲惨的遭遇，而终于在全国解放之后在武汉重逢的故事。

1956年我和何其芳同住在北京医院的时候，两个人都还天真地谈到各自的创作设想。其芳还直夸这个题材好，连声点头笑道：

“写嘛，写嘛！”……可是，我也还是一直忙于行政组织工作，无法动手。这些书和我保存的巴老的信，在“文革”期间都消失了。然而，这个“小说梦”却还在。

——1975年夏，我出狱之后回到重庆，在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书库里工作，整天清理旧书报刊，写



作家写作家

卡片。

大约是 1976 年春天，我突然发现一堆旧书刊里有几本三十年代的文学杂志。我看到了我的几篇小说。尽管我也想到，我出狱时会宣誓般做过保证，绝对服从任何工作的分配，保证做好本职工作，但觉白天的工作实在不需要动什么脑筋，可否在晚间动手写点小说，把 1956 年和其芳谈的那个设想写出来？一下子，犹如被一场噩梦纠缠住了，我随时陷入如梦似幻的一些想象中，苦思冥想，焦灼不安，经常失眠，十分苦恼。

我终于抑制不住，和一位还能谈点想法的同志透露了这点信息：我不知我是否可以还写点东西。

这位同志认真思索了一下，然后慎重地提醒我：

“会不会有人会这样想：你还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还想死灰复燃？”……

我猛然想到，我的结论中还有这样一条严重罪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这条罪行早已经宣判了我文学生涯的死刑。这时候，我才清醒过来，我不禁狠狠把自己谴责了一通：想得太天真了，真是本性难移！

“小说梦”彻底破灭了。我像突然掉在一个很深的冰窟里，全身心都冰冷了，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我这时候才真正懂得了一个人到了“万念俱消”的



境地是什么滋味。我也觉得我突然老了十年，只能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1978年春天，我又终于回到北京，又回到文学工作方面来，还在工作之余写了点散文，又得到巴老的鼓励。

例如1982年6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祝贺巴老获得意大利但丁奖的文章：《心灵中仍燃烧着希望之火》，寄给了巴老，很快就接到巴老在病院里给我的回信：

荒煤同志：

信悉。我的病已全愈，但写字仍感困难。文章已拜读，觉得你把我写得比实际好了些，高了些。不过对你的好意我感激。你支持我讲真话，我高兴。写字吃力，许多话见面再畅谈吧，另封寄上《近作三》一册。祝好！

巴金

我为巴老谦虚的精神所感动，这更加激发了我，即使我主要的精力和时间还将用在行政组织工作方面，我还是尽量抽点时间写点散文，觉得也是对巴老期望的一个回答。